中国出土高丽青瓷述论*

彭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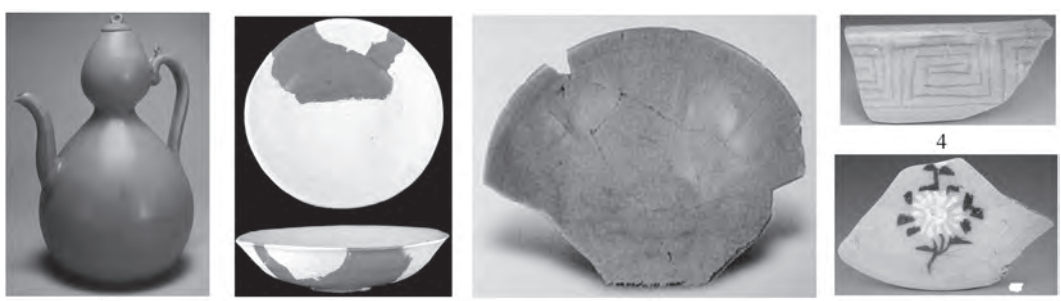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高丽（918～1392年）青瓷是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代表[1]，其产品的向外流布，西至波斯湾的巴林[2]，北抵漠北的蒙古（哈喇和林城址）[3]，东北达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乌苏里斯克城址）[4]，而以日本、中国出土数量为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陶瓷界开始关注中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此后随着资料的积累，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深入[5]。本稿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类型、分期、流布背景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分组与类型

根据器物形制和装饰特征，大体上可以将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包括北京乌古论窝论墓[6]、吉林德惠揽头窝堡金代遗址Ⅳ T4②[7]、浙江杭州市半山钢铁厂墓[8]、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9]等单位，出土数量较少，器形可辨者有碗、注壶、盘、炉、瓶、罐等，绝大多数是素面和刻划花纹的青瓷，也有少量镶嵌青瓷（图一）。



图一　第一组高丽青瓷

1. 乌古论窝论墓执壶　2. 揽头窝堡遗址Ⅳ T4②层碗　3. 半山钢铁厂墓碗　4、5. 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瓷片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2JJD780004）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

乌古论窝论墓执壶，整体葫芦形，曲柄，弯流，底部不施釉，边有三组砂粒支烧痕（图一，1）。揽头窝堡遗址Ⅳ T4②层碗，侈口，曲腹，圈足，外壁素面，内壁以纤细的阴线刻划简单的花纹。釉色青中泛灰，裹足满釉支烧（图一，2）。类似细线阴刻简率花纹的高丽青瓷碗，在韩国全罗北道群山市飞雁岛沉船也有发现[10]。杭州半山钢铁厂墓碗，花式口，弧腹，圈足，内壁阴刻花草纹，裹足满釉支烧，可见3个支烧痕（图一，3）。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出土14片高丽青瓷中，器形可辨者有盘、炉、瓶、罐，花纹有阴刻连体变形回纹、镶嵌黑白菊花等（图一，4、5）。

第二组：包括河北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11]、辽宁建平县小塘乡苏子沟村[12]、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辽阳北园6号墓、辽阳庞夹河1号墓[13]、辽阳北园5号墓[14]、沈阳市大东区望花街M2、和平区砂山街M2[15]、小南边门大街M2[16]、黑龙江哈尔滨市郊水田村窖藏[17]、吉林前郭塔虎城遗址T406③[18]、内蒙古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宁昌路故城[19]、集宁路古城遗址03JNLT049054①F22JC26[20]、北京元大都遗址、江苏扬州三元路工地、浙江杭州环湖路工地等单位或地点[21]，出土数量较多，器形比较丰富，有碗、盏、盒、尖底杯、盏托、枕、高足杯、圆口盘、八方盘、砚滴、梅瓶等，除砚滴外，均为镶嵌黑白花的青瓷（图二）。

碗出土数量最多，可分二型。A型，敞口。见于哈尔滨水田村窖藏，斜弧腹，圈足，内底镶嵌轮菊，内壁镶嵌折枝菊花，均为白色；外壁黑白镶嵌折枝菊花。圈足内有3个支烧痕（图二，1）。B型，敛口。出土于辽阳庞夹河1号墓（图二，2）、沈阳小南边门大街M2（图二，3）。弧腹，圈足，内壁用白粉镶嵌折枝荔枝纹，外壁自口沿下依次镶嵌水波纹带、黑白折枝菊花或荔枝、黑白折枝菊花。

盘发现2件，浅腹，腹壁斜直，圈足。沈阳望花街M2盘，圆口，盘内纹饰均为白粉镶嵌，内壁对称饰四朵菊花，底正中一朵菊花，外饰两道弦纹，弦纹外接九朵云纹。外壁黑白镶嵌四朵菊花。圈足底可见3个点状支钉痕（图二，4）。沈阳小南边门大街M2盘，八方口，内底白粉镶嵌如意云纹，外壁按照边口镶嵌八组成对的折枝菊花，花为白色，枝叶为黑色。口圈足底有3个支钉痕（图二，5）。

盏见于辽阳北园6号墓（图二，7）、前郭塔虎城遗址（图二，6），形制、装饰近同，均为敛口，深腹，圈足，内壁素面，外壁口沿下镶嵌白色云雷纹一周，外壁镶嵌折枝菊花，花朵嵌白，叶子嵌黑。裹足支烧。2件盏的器形以及纹饰的布局，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陶花令盃”铭镶嵌青瓷盏都很接近[22]。

高足杯见于敖汉旗宁昌路故城（图二，8）、扬州三元路工地[23]、杭州环湖路工地（仅存上部的杯；图二，9）等，均镶嵌黑白花纹。宁昌路故城高足杯内壁纹饰自底向上依次为轮菊、云朵、仙鹤4只与白色斑点、云雷，仙鹤局部嵌黑，其他纹饰均嵌白；外壁盏的纹饰自上而下依次为云雷、开光折枝菊花4朵，足上部为轮菊、云雷。

尖底杯出土于建平苏子沟村，敛口，弧腹，尖底，腹中部镶嵌白色菊花，口6.6厘米，高8.2厘米（图二，10）。韩国庆北大学博物馆[24]、全南大学博物馆[25]均藏有类

图二　第二组高丽青瓷

1. 水田村窖藏碗　2. 庞夹河1号墓碗　3. 小南边门大街M2碗　4. 望花街M2盘　5. 小南边门大街M2盘
6. 塔虎城T406③盏　7. 北园6号墓盏　8. 宁昌路故城高足杯　9. 杭州环湖路工地高足杯　10. 苏子沟村尖底杯
11. 兰家乡石灰窑村枕　12. 砂山街M2盏及盏托　13. 北园5号墓盒　14. 集宁路古城砚滴
15. 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梅瓶

似形制和装饰的尖底杯。

枕仅见于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束腰长方形，两端各有一圆孔。枕面及两端镶嵌黑白折枝菊花纹，枕两侧镶嵌白色卷草。长17.4厘米（图二，11）。与此形制完全相同的枕亦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26]。

沈阳砂山街M2盏及盏托均为花式口，盏深腹，足较高，外壁镶嵌黑白菊花纹（图二，12）。相同的花口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乌苏里斯克城址曾出土过。盏托中心为覆莲装饰的高台，托面镶嵌黑白菊花，喇叭状十瓣花形。类似的镶嵌菊花纹盏托，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新安20424）以及康津郡沙堂里瓷窑遗址[27]。

出土于辽阳北园5号墓的青瓷盒，扁圆形，子母口，矮圈足，盖面镶嵌团状菊花纹，圈足内有3个支烧痕迹（图二，13）。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青瓷砚滴（03JNLT049054F22JC26:9），龙首龟身，龙首口衔把莲负于背上，背部正中有一注水孔，与龙首口部相通。龟身每片甲片内部都阴刻一个“王”字（图二，14）。

梅瓶仅见于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浅杯口，短束颈，丰肩，长腹，胫部外撇，隐圈足。肩部镶嵌白彩弦纹及莲瓣，腹部主题纹饰为黑白彩镶嵌的折枝花、祥云和仙鹤，胫部白彩镶嵌仰莲瓣及变体回纹（图二，15）。

第三组：包括安徽滁县墓葬[28]、江苏吴江同里镇[29]、南京南郊牛首山[30]、山东蓬莱水城小海沉船[31]等单位或地点，出土数量少，器形有大罐、碗、梅瓶，釉色青灰发暗，均为镶嵌瓷器（图三）。

滁县出土的罐，矮直领，圆肩，鼓腹，下部斜收，圈足。肩、腹分别用黑白彩镶嵌缠枝花、云龙，腹部下端用白彩镶嵌仰莲（图三，1）。吴江同里镇（图三，2）、南京南郊牛首山（图三，3）出土的梅瓶，形制相近，小口，短颈，溜肩，前者肩部较丰，长圆腹，束胫，隐圈足，肩、胫部均为简单草率的黑白彩镶嵌莲瓣，腹部纹饰为垂柳、竹子、梅花；后者腹部纹饰为荷花、垂柳。蓬莱沉船发现的瓷碗是典型的粉青沙器，内底白彩镶嵌莲花，内壁镶嵌白彩波浪纹，外壁白彩镶嵌弦纹（图三，4）。

图三　第三组高丽青瓷

1. 滁县墓葬罐　2. 吴江同里镇梅瓶　3. 南京南郊牛首山梅瓶　4. 蓬莱水城小海沉船碗

二、各组的时代

第一组：墓志载乌古论窝论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从莱州迁柩改葬大兴良乡，其卒年墓志及史书皆不载，但不会早于其子乌古论元忠的生年——天眷二年（1138年）。杭州半山钢铁厂墓出有“绍兴九年文思院铸建宁军节度使”铜印[32]，该墓时代不会早于1139年。墓主人推测为宋高宗时期任建宁军节度使的韦谦[33]，《宋会要辑稿》职官一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建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韦谦除太尉进封开国公。”又按《宋会要》礼四十一《辍朝》的记载，韦谦约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宫中为其辍朝二日。故推测此墓的年代约在1157年初。揽头窝堡遗址目前只刊布了第六号金代房址的发掘资料[34]，整个遗址出土的遗物以金代为主，未见晚到元代者。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高丽瓷器均出土于水池内堆积，水池内其他共存遗物未见晚于南宋末年的。综上可以推断，第一组各单位的时代为南宋·金代，即12世纪中期前后至13世纪中期前后。

第二组：石家庄后太保村是蒙元重臣史天泽家族墓地所在，出土墓志的M4墓主为史天泽四子史杠，他于延祐三年（1316年）“二月甲申葬真定之真定县大保庄太尉（史天泽）兆次”。M1是其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主即使不是卒于1275年的史天泽，该墓的时代也不会早于此（详见后文）。出土青瓷砚滴的集宁路F22JC26，根据共存遗物推断为元代晚期即集宁路废弃之时。与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形制完全相同的高丽瓷枕亦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约沉没于1323年）。辽阳北园5号墓伴出外挂半釉、粗红胎的窑变钧釉盘，北园6号墓伴出褐釉四系罐、钧窑蓝釉碗，沈阳小南边门M2伴出黑釉四系瓶，哈尔滨水田村窖藏共出的钧釉钵、碗等，均为北方元代墓葬习见。据此大体将第二组的时代推测为蒙元时期，即13世纪中期前后至14世纪中期。

第三组：蓬莱沉船瓷碗属于典型的粉青沙器，时代不早于14世纪后半。江苏出土的2件梅瓶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准备色”铭镶嵌云鹤纹梅瓶[35]，在器形及装饰意匠上都很接近，后者时代为14世纪后半。相似的例子还有庆北大学校博物馆所藏的被定为朝鲜时代的粉青沙器镶嵌莲花纹梅瓶[36]。滁县墓葬出土的云龙纹罐子，也有学者认为是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37]。综上可以推断第三组的时代约在元末明初即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初。

三、高丽瓷器流布中国的背景

北宋宣和六年徐兢等出使高丽，归国后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留下了关于高丽瓷器最早的文献记载[38]，然目前尚无考古资料表明高丽瓷器流布到北宋与辽境内。前文归纳的三组，实可视为高丽青瓷流布中国的三个阶段（以下称三期），每个阶段的流布，又因地域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1. 北方地区

第一期高丽青瓷发现数量很少，仅有北京乌古论窝论墓、德惠揽头窝堡遗址两例。金与高丽之间互市贸易，文献记载极少，《高丽史》卷二十明宗十五年（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明确记载“义州禁两国互市”。虽然双方使节往来存在某种形式的“贡赐贸易”[39]，金末期蒲鲜万奴割据辽东时边境也有小规模的走私[40]，但总体而言，金丽双方的贸易交流是不发达的。第二期高丽青瓷数量激增，中国境内高丽青瓷大多数出土于这一时期，且以北方地区发现较多。文献一方面明确记载了元统治者向高丽索求瓷器，如《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三》（国书刊行会本，1909年）载：“（忠烈王十五年，1289年）戊午耽罗安抚使忽都塔儿还自元，中书省牒求青砂甕盆瓶。”另一方面也记载了高丽向元进献瓷器，如《高丽史》卷三十一《忠烈王四》载：“（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年）壬午遣郎將黃瑞如元献金画甕器、野雉及耽罗牛肉。”集中出土于辽阳、沈阳等地的高丽瓷，则应与大量高丽人入据辽东有关。《元史》卷五十九《地理二》载：“沈阳路……元初平辽东，高丽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西京、都护、龟州四十余城来降，各立镇守司，设官以抚其民。后高丽复叛，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中统二年，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及高丽举国内附，四年，又以质子淳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元贞二年，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至顺钱粮户数五千一百八十三）。”根据《老乞大》、《朴通事》的记载，元代北方与高丽的贸易，既有通过辽阳的陆路，也有通过直沽的海路[41]。元人朱晞颜《鲸背吟集》[42]之《分鯮》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复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有研究者认为，诗中所说的向辽东和高丽的分路航行是在山东半岛附近[43]。第三期蓬莱沉船发现的高丽瓷器，或可视为这种贸易交流的余绪。

2. 南方地区

第一期即南宋时期，流入南方的高丽青瓷数量比北方多，质量颇高，且集中于浙江境内的杭州等地。“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44]四明即宁波。尽管《宝庆四明志》所载由高丽输入宋境的货物中，“青器”属于“粗色”（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属于细色）[45]，但恭圣仁烈皇后（宁宗杨皇后，1162~1232年）宅、韦皇后（1180~1159年，徽宗皇后，高宗之母）侄韦谦墓等出土的高丽青瓷，曹勋[46]《松隐集》中所载“高丽炉”，似都表明高丽瓷器是为南宋统治者上层喜好的器用[47]。第二期即元代，作为“细色”市舶货物的“高丽青器”[48]的发现，南方显著比北方少，也较南宋时期少。背后的原因尚难

推知。第三期即元末明初，高丽青瓷亦颇罕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曹昭（元末名称人）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初）卷下“古窑器论”云：“古高丽窑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儿者不甚值钱。”[49]可见明初的南方地区，高丽瓷器已经成为古董鉴藏的对象了。

四、两个相关问题

中国出土高丽瓷器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的墓主；二是《袖中锦》的成书年代。

（1）根据史杠墓志及残史氏族谱所收《丞相（史天泽）行状》[50]，史天泽墓在后太保村无疑。墓志载史杠“卜以（延祐）三年二月甲申葬真定之真定县大保庄太尉兆次”；《丞相行状》载史天泽“遂以（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庚寅葬于真定之西原”。M1在史氏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常被推测为太尉史天泽墓。有学者根据龙泉青瓷的编年成果，认为M1龙泉青瓷罐盖及划花浅腹碗的时代不会早于14世纪早中期，与史天泽卒葬时间存在矛盾[51]。按《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52]，史天泽有四位夫人，均卒于1275年之前。考古资料所建立的编年序列，与入葬年代存在不吻合处。目前来看，确定M1为史天泽墓，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假设若M1为史天泽墓，则其中出土的镶嵌青瓷梅瓶，既可从元帝赏赐的角度考虑[53]，也可从史天泽侄史枢曾远征高丽珍岛悉平其地的历史背景考虑[54]。对于高丽镶嵌青瓷的编年来说，此墓墓主的确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2）《袖中锦》“天下第一”条载：“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卤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鲊、京（文渊阁四库《说郛》作右）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夫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研究高丽青瓷的学者，经常将《袖中锦》作为宋代（南宋、北宋）文献引用来说明高丽青瓷的成就。这是值得商榷的。“盖书贾之所依托”（《四库全书总目》）的《袖中锦》，最早收录于元末明初人陶宗仪（1329~约1412年）《说郛》，故其不应晚于明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郛》，未题撰者太平老人的时代（按《说郛三种》未收录《袖中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所收《袖中锦》，皆出自清代丛书《学海类编》，均题“宋太平老人撰”。然以上各种版本的《袖中锦》，除了前述“天下第一”条外，还都有“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其成书的年代，或不会早到南宋。

注　释

［1］ 郑良谟（著），金英美（译）. 高丽青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 赵冰. 波斯湾巴林国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的东亚和东南亚瓷器［A］.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辑）［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605 .

［3］ 吉谢列夫1948~1949年组织俄罗斯科学院对哈喇和林进行调查，资料现存蒙古国立博物馆. 三片镶嵌青瓷，推测器形为注壶，纹饰为覆莲、如意头、菊花. 参见亀井明德. 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調查報告書——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ル調查/ モンゴル国立博物館保管資料調查［J］. 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報告書2［M］. 2007：56，57 .

［4］ Е. И. Гельман. ГЛАЗУРОВАННАЯ КЕРАМИКА И ФАРФО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ИМОРЬЯ, ст. 182, рис. 63, Владивосток , 1999. 金沢陽（訳）. 沿海州における遺跡出土の中世施釉陶器と磁器［J］. 出光美術館館報，105卷图32，1998：14.

［5］ 小林仁（著），陈馨（译）. 中国出土高丽青瓷考［A］.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文后详列了这些研究成果.

［6］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金墓发掘报告［A］. 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C］. 1983. 发掘者推测其为临汝窑产品.

［7］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杭州钢铁厂宋墓概况［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C］.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467.

［9］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34—36 .

［10］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东亚中世海道——海商、港、沉没船［M］. 东京，2005：45 .

［11］ a.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石家庄市后太保元代史氏家族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1996（9）.
b.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石家庄后太保村元代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A］. 河北省考古文集［C］.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44—369 .

［12］ 朝阳市文化局. 朝阳馆藏文物精华［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218 .

［13］ a. 丁丽. 辽阳出土的高丽青瓷［J］. 辽海文物学刊，1994（2）.
b. 邢爱文. 辽阳博物馆馆藏精品图集［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 .

［14］ 同注［13］. 此墓材料早年即发表. 见：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辽阳发现辽墓和金墓［J］. 文物，1977（12）.但当时没有识别出为高丽青瓷.

［15］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

［16］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另参见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辽宁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7］ 田华等. 黑龙江哈尔滨市郊发现元代瓷器窖藏［J］. 考古，1999（5）.

［1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19］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 敖汉文物精华［M］. 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193 .

［20］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89 .

b. 刘毅. 元集宁路窖藏出土的鳌形砚滴与高丽青瓷断代［A］.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辑）［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84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志见告，该城2011、2012年度的发掘出土了一些高丽镶嵌青瓷.

［21］ a. 冯先铭. 泰国、朝鲜出土的中国陶瓷［J］. 中国文化，1990（2）.

b. 冯先铭. 中国出土朝鲜、伊朗古代陶瓷［A］.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7 .

［22］ 郑良谟（著），金英美（译）. 高丽青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26，图104.

［23］ 扬州博物馆，扬州文物商店. 扬州古陶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附图.

［24］ 〔韩〕庆北大学校博物馆图录［M］. 1988：181，图版207.

［25］ 〔韩〕全南大学校博物馆特别展：全南的高丽陶瓷器［M］.全南大学校博物馆，1991：37，图21.另参见Edward B. Adams. *Korea's Pottery Heritage*, Vol.Ⅱ ［M］. Seoul：Seoul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0：图27、28.

［26］ 〔韩〕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 新安船发掘30周年纪念特别展：新安船及东亚的陶瓷交易［M］. 2006：181，图版144. 与之菊花镶嵌布局甚为类似的一件枕出土于日本京都平安京左京四条三坊十四町，见：新安船发掘30周年纪念特别展：新安船及东亚的陶瓷交易［M］. 第182页，图版145 .（南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M］卷十四. 张国星据涉闻梓旧本［M］. 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51. 记载：“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 问其何理，曰：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 是则真知睡者耶.”

［27］ 新安船发掘30周年纪念特别展：新安船及东亚的陶瓷交易［M］. 第185页，图版148；第186页，图版149 .

［28］ 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81 .

［29］ 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苏上海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5 .

［30］ 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苏上海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6 .

［3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 蓬莱古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4，彩版四〇.

［32］ 宋史［M］. 卷一五四·舆服志六载：“（元丰六年，1083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

［33］ 宋会要辑稿［M］.后妃二：“（绍兴）十四年，十月八日，皇太后款谒家庙，宗族推思有差. 皇太后兄故赠武功大夫、秀州刺史韦宗闵，特赠崇庆军节度使；故赠武功大夫、真州刺史韦宗颜，特赠安国军节度使……侄右武郎韦谦除右武大夫，依前带御器械.”宋史［M］卷三十一高宗八：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加韦谦太尉”.

［34］ 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 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J］. 考古，2003（8）.

［35］ 郑良谟（著），金英美（译）. 高丽青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21，图95.

［36］ 〔韩〕庆北大学校博物馆图录［M］. 大邱：庆北大学校博物馆，1988：221，图版288.

［37］ 小林仁（著），陈馨（译）. 中国出土高丽青瓷考［A］.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38］ 据今西龙依知不足斋的点校本，近泽书店，1932 .

［39］ 赵永春，吕士平. 金丽使节贡赐贸易探析［J］. 北华大学学报，2009（2）.

［40］ 金史［M］卷一百九完颜素兰传：“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完颜）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 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高丽史［M］卷二十二高宗世家一：“时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 先是金再牒乞籴国家令边官拒而不纳. 自去年金人因兵乱资竭爭齎珍宝义、静州关外互市，米谷至以银一锭换米四五石. 故商贾争射厚利，国家虽严刑籍货，然犹贪渎无厌，潜隐互市不绝.”

［41］ 汪维辉.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参见陈高华.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J］. 历史研究，1995（3）.

［42］ 四库全书［M］. 集部五别集类四.

［43］ 陈尚胜. 中韩交流三千年［M］. 北京：中华书局，1997：65 .

［44］ 宋史［M］卷四八七高丽传. 朱彧. 萍洲可谈［M］卷二（李伟国点校本，中华书局，2007）：“高丽人泛海而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 二路亭传一新. 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

［45］ 罗濬等. 宝庆四明志［M］卷第六郡志叙赋下市舶条，宋元方志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6］ 按宋史［M］卷三七九曹勋传，勋字功显，宣和五年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中侨居天台，以韦太后北还迎銮功，官至昭信军节度使. 孝宗朝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1174年卒，赠少保.

［47］ 松隐集［M］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M］本）高丽炉一枚寄虎丘结老为说偈言：兹炉之先，鲸波空际.有国曰韩，以陶以器. 奉之函丈，宝烟轻细. 此一瓣香，用严报地. 另最近在杭州出土的1件高丽青瓷器盖上刻有“贵妃”铭，也说明了此情况. 参沈琼华. 浙江与高丽青瓷［A］. 翡色出高丽——韩国康津高丽青瓷特展［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18 .

［48］ 王元恭等. 至正四明续志［M］. 卷第五，市舶物货条. 宋元方志丛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9］ 据杨春俏依四库全书［M］注释本，中华书局，2012 .

［50］ 孟繁峰. 谈新发现的史氏残谱及史氏元代墓群（续）［J］. 文物春秋，1999（4）.

［51］ 谢明良. 对于史天泽墓的一点意见——兼评《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J］. 故宫文物月刊，二十卷一期（总229期），2002 .

［52］ （元）王磐. 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A］. 元文类［M］. 卷五十八，国学基本丛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

［53］ 元史［M］.卷一百五十五史天泽传：“（至元六年）帝以宋未附，议攻襄阳，诏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往经画之，赐白金百锭、楮币万缗.”“十一年，诏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 天泽至郢州遇疾，还襄阳，帝遣侍臣赐以葡萄酒. 还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与尚医驰视，赐以药饵……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 讣闻，帝震悼，遣近臣赙以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 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54］ 元史［M］.卷一四七史天倪传：“（至元六年）高丽人金通精据珍岛以叛，讨之，岁余不下. 七年，进枢昭勇大将军、凤州经略使. 枢至，谓诸将佐曰：‘贼势方张，未易力胜，况炎暑海气蒸郁，弓力驰弱，猝不可用. 宜分军为三，多张旗帜以疑之. 吾与诸君潜师捣其巢穴，破之必矣.’与战，大破之，其地悉平.”

A Study on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Peng Shanguo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current material, even though the chronological analysis and detailed periodization are still not available.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unearthed units and current chronological study of Koryo celadon wares, the age of three groups above can be inferred as follow: the first group, around mid 12th century to around mid 13th century (the period of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econd group, around mid 13th century to mid 14th century (Yuan Dynasty); the third group, mid 14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15th century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Therefore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s far as the northern region is concerned, the small number of Koryo celadon wares found in the first period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trade between Jin Dynasty and Koryo was block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second period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an Dynasty and Koryo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also the fact that the finding are mostly in Liaoyang and Shenyang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people from Koryo moving into the east of Liaoning during that time. As to the Koryo celadon wares found in southern region like Hangzhou and Ningbo, most of them are the product of trade which is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